

RESEARCH LIBRARY OF SOCIAL SCIENCE IN JIANGXI

江西
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通向学术真际之路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

李承贵 著

T · X · X · S · Z · J · Z · L

江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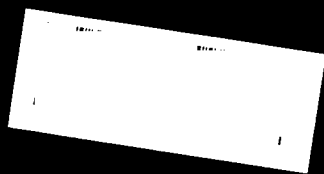
JIANGXI

通向学术真际之路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

李承贵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向学术实际之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李
承贵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6

(江西社会科学文库/刘孚威主编)

ISBN 7-210-02561-8

I. 通... II. 李... III.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IV. 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8902 号

5
30P
96

通向学术实际之路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

李承贵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50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10-02561-8/C·58

定价: 23.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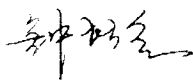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 330002 传真: 8511749 电话: 8511534(发行部)

E-mail: jx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着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

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新世纪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江西,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去解答。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江西向为“文章节义之乡”,素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著称。在历史的长河中,江西不但涌现出许多名扬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且涌现出不少影响古今的学问家、思想家。但是,我们不能沉缅于先哲的辉煌,而应该创造更加璀璨的未来。江西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直在为此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世纪之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省社联大力实施“精品战略”,积极组织和扶持社会科学精品力作的撰述和出版,其实现形式是:推出“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工程,每年拿出一笔事业经费,资助出版 10 本理论上的厚重之作。这是我省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好事、实事,如此年复一年,坚持下去,必将蔚为大观。

21 世纪,将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将是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世纪。江西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大家努力啊!

祝愿社会科学研究精品力作不断问世。

承贵兄的大著完成，一再命我也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表点意见，自知不是理论家，要建构一套方法论体系，非我所长，我研究的是19、20世纪中国史。“史无定法”，从何说起？长期在这一领域打滚，历经若干挫折、迷误与抉择，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可以引起思考的资料

“不疑不悟”

我珍藏着一方闲章，是厚着脸皮向篆刻高手小敏兄讨来的。印文是“不疑不悟”，边款全文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袁师着以黄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陈小敏记”。学术界无不承认黄宗羲在明末清初为中国思想史大放异彩，却很少人提及这一勇敢的怀疑精神是他的卓越成就的内在动力。其实，这是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有成就的学者以及大小改革家、创新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愚鲁如笔者，亦累受其惠。准确点说是，学术上不时有所发现；精神上则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一再遭到莫名其妙的压力，为简朴的书生生涯增添几笔有趣的色彩。

还没有到讲故事的闲暇岁月，只能简单说说一二大体不伤他人的小例。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论一元论》，私心窃喜，

以为不是人云亦云之作。不料在闭幕式上一位美国学者语惊四座：“我多次参加台湾开的孙中山研讨会，第一次到大陆开会。可是，两边都把孙中山当神，你们做的不是学术研究！”（大意）

这是迎头泼来的冷水！不知道其他人感受如何，对我来说却是很好的清凉剂。经过多年的思考，加上看到不少新资料，终于明白自己是慑于孙中山的光环，再去收集资料和写作。在假问题和鸡毛蒜皮中打转，何来学术价值？我的文章冀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时讨论得颇为热烈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就这一小问题而言，我的确花了不少气力，不无一二新意。可是，我没有首先回答两个根本问题：

1. 孙中山是哲学家吗？换个说法是，按当时的哲学发展水平，其哲学思想有无讨论的价值？

2. 他的主要论题——“知难行易”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这个命题有无值得肯定的价值？

其实，孙中山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厌其烦地宣讲“知难行易”，无非是要“后知后觉”（干部）和“不知不觉”（民众）之辈跟着他那样的“先知先觉”走；让他们懂得“知行分任”、“不知也能行”，我已发明了最好的理论，你们不行，就要承担“阻碍进化”和革命失败的责任！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这样的愚民哲学，显然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至于其理论思维的粗浅和不严密，对思想家来说虽属致命伤，但与上述失误相比，已属次要问题。

大彻大悟不是空喊可以达到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意识形态的网罗中生活和成长的。此外，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传统和当前话语霸权的羁绊。自己的许多观念，说不定就是社会环境养成的偏见。一切都要重新审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有时聒噪之声还挺大。但压力首先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对故我的挑战。当理性引导

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要突破过去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边界的时候，是尊重自己的头脑而甘冒责难，还是走蹈常习故的平安大道？这是很难的选择。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资料积累，我写了一篇5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写作中几次掷笔长叹，有一次竟停笔两周，不想写下去。不是几位朋友激励，根本无法完篇。这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战。人有造神的本能。把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打碎是不是过于残忍？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是两个因素：1. 学术良知，不能讲假话；2. 对祖国命运的理性考虑，不能把历史的经验白白丢掉。而那位美国学者的一声断喝，对加速我桀骜不驯的野性的复活也十分有益。奴性是后加的；人性复归，就好奇，就有无穷的疑问。

问题意识

困扰古今中外哲人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历史学家也为此备受折磨。

没有人敢公开否认史学研究的基础。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仍是史料工作薄弱。大量不堪卒读的意识形态史学，多半是不肯面对史料加削足适履炮制出来的。不过，在解决这一前提后，仍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为学术而学术。力求弄清历史的过程和前因后果，其他在所不计。这是值得称道的追求，永不熄灭的流派。

另一个是追求学术与思想的统一。这里说的思想指的是对人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我选择的是后者。作为研究19、20世纪中国史的中国人，我关注的中心一直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此坎坷？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度过的。富强、民主、自由成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政治早熟

的同龄人关注的热点。后来，我的研究工作也一直贯穿着这一思想。

在我看来，人们的主观关注是选择课题的关键，又是驱使认真的学者寻求学术完善的强大动力。研究就是回答问题。围绕假问题打转，是虚掷生命；等而下之者，甚至践踏良知。即使是真问题，学术和社会意义亦有大小之分，体现着选择者的学识、胆识和处境。所谓“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似乎就是这个意思。

举个例子来说，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广泛关注。有人便说，这是近代岭南文化开放性的继续。我对这一现象也深感兴趣。但我从史料中看到的情况却完全相反，鸦片战争后的岭南非常封闭，带来一系列恶果；后来的成功另有原因，历史教训不应忘记。严格的学术研究可以带来深刻的思想启示。如果不下苦功研究真实情况，很可能成为错误观念的宣传者。

掺入主观关注会不会苛责古人？人们常说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的理解。这无非是要弄清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关人物的思路以及他们行动的根据。但停留在这一步是不够的。必须比评论对象站得更高，做事后诸葛亮，人类才能吸取历史经验，不断前进。一个范例是波普尔在其经典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分析，从中发现了极权主义的根源。人们普遍承认这是对思想史的一大贡献。毋庸讳言，没有他对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极端憎恨，也就不会有对柏拉图政治思想如此深刻的剖析。同样，如果不站在 20 世纪思想的高处，也不可能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史事和人物作出全面的评价。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憎恨专制，因而对洪秀全思想评价甚低；反对封闭，对林则徐也不无微词——为了驱赶在他家乡的两个英国平民，竟鼓吹调炮演习，准备打仗！如此等等。有些史家不喜欢和不愿做后一工作，这是不同流派的差异，完全应该互相尊重，并行不悖。

冲破古老伟大民族心态的羁绊

学术是世界性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如此,人文科学也不例外。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不同国家亦基本相同。可是,学者在工作中往往有许多自觉不自觉地预设,弄得不好,有的可能成为思想镣铐。“后殖民”、“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这是当前广为流行的观点。洋鬼子霸气十足,痛骂一顿,谁曰不宜?可这是学术拒绝情绪。我宁可选择另外一条思路。

我想,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受到不平等待遇,理所当然地应该反侵略,捍卫主权,还要力争有朝一日真正与最强大的国家平起平坐。你是落后国家,那就要老老实实学习别人的先进文化,使自己强大起来;加上其他手段,方有梦想成真的一天。现代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这个领域反侵略后果不堪设想。那些口号虽然也是现代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但那是非主流的极端流派。应该研究那些观点,汲取其合理成分。可是,如果有人以此为借口反对现代文化的基本框架(法治、自由、民主、宪政、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福祉必然落空。中国向西方学习已经 100 多年,但富强、民主的理想至今未能实现。主要原因就是舍本逐末,或只在器物层面打转,或因道德义愤而认同极端,这正是 19、20 世纪中国最应记取的历史教训。

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过去,要走出困境,重现辉煌靠什么?人们热衷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甚至说那里有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其出发点也许非常崇高,但说到底这是不太健康的恋旧情结。即使你说得对,也不过是有待证实的设想,何况历史已一再证明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往往为狂想、蛮干开路。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研究者对世界现状的认识

息息相关。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汉族的文化传统,用以统一全国尚且不能,遑论世界?多元异彩纷呈,但异中有同。任何国家的现代文化,其现代性的基本特点大体相同。若拘于民族性,抗拒现代性,虽可获得某种情绪的满足,但对国家的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十分不利。因此,不论研究什么都不能忘记世界文明的进程。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承贵兄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史论》一书,是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研究方法一次较全面较准确的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十分认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启示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世纪之交完成此书,对总结学术经验,以规范、深化 21 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

是为序。

袁伟时序于中山大学

2002. 5. 27

任何一门学问,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学问就是方法。方法的枯竭便是学问的停滞,方法的繁荣则是学术的发展。而在20世纪,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既普遍又深刻。这,便是本书把“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作为一项研究课题的基本根据。

20世纪上半叶,是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输入中国之际,处于这个背景下的传统研究方法,由过去的主导地位逐渐边缘化。自然科学方法、人文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由于三大方法互有长短,加上学术主体的兴趣各异,以致学术研究中三大研究方法的互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自然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人文主义方法逐渐找到它们的位置;而它们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得与失,也成为后来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具体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我用了3章的篇幅进行讨论。第1章描述了19、20世纪之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状况,主要说明的问题是:研究方法自觉意识的形成原因和传统研究方法面临着哪些挑战。第2章介绍和探讨了自然科学方法输入及其特征,马克思主义方法输入及其特征和人文主义方法的输入及其特征等问题。第3章揭示了人文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自然科学方法彼此互动的情形,并对这种互动进行了检讨。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方法取得了独尊

地位,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学术政治化增强,非马克思主义方法如传统研究方法、人文主义方法、自然科学方法都遭到排斥。虽然在相对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应用也取得了一定学术成就,但马克思主义方法最终还是走向了教条化,导致了研究方法的枯竭,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萧条,导致了学术研究的停滞。具体而言,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研究方法,我也用了3章的篇幅进行讨论。第4章追寻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独尊地位确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成绩极为有限。尤其是伴随马克思主义方法独尊地位的确立,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方法遭到排斥,致使研究方法单一化,并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学术研究中教条化的原因、历程及其后果。第5章再现了十年建设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情况,通过文化继承争论、美学问题争论、历史人物评价争论、形式逻辑问题争论等,考察了研究方法应用状况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方法内部各方法因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具体学科的关系、非马克思主义方法(自然科学方法、人文主义方法、传统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地位、研究方法中的事实性与价值性关系问题等。第6章介绍了50~60年代学术界对研究方法探索的情况,认为学术界在史实与史论关系、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性质和应用、传统研究方法性质和应用等方面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20世纪后20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学术界空前活跃,研究方法问题成了讨论的热点。这20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对过去在研究方法上的失误进行反思和检讨,二是展开对研究方法的深入研究,三是推动研究方法的变革。具体而言是:第7章描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走向复苏

的过程,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复苏的原因,并对这个时期学术界对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思和对排斥非马克思主义方法行为的检讨等情况做了介绍和研究。第8章介绍了20世纪后20年学术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索的情况,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研究方法关系、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层次、结构和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等方面的探讨,都达到较高水平,为深化新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第9章展示了后2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成果和应用状况,探讨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变革走向。

如上9章描述的即是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基本演进历程。这个历程所演绎的不仅是研究方法类型的嬗变,而且是各种研究方法的交织互动;不仅是研究方法与影响研究方法诸因素的复杂关系,而且是研究方法对学术研究的支配意义;不仅是研究方法应用成果的喜悦,而且是研究方法误用失败的痛苦;不仅是现代中国学者对学术规范的渴望,而且是他们在不懈探索中所提炼的学术研究方法智慧。因而,我用了两章的篇幅进行概括与提升。第10章主要讨论研究方法与学术研究、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的关系问题,认定研究方法及其正确应用对学术研究的深化、对新学科的建设和对学术规范的建立都有积极意义。第11章则主要讨论了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及学术研究中事实性与价值性关系等问题。

研究方法之间有种类、层次、性质等方面的不同,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处理好各种方法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宏观地讲,一个时期如果能处理好各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就有可能繁荣,反之则必然萧条。微观地讲,同一问题的研究可能需要多种方法共同参与,但因各研究方法在解决此

问题中的位置不一样,这就需要确实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想获得积极成果的话,那么各研究方法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便是一项十分现实的课题。

学术研究活动的展开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研究对象,一是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应用,如果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复杂性,那么其研究的结论是很难靠得住的。因此,在一项具体研究活动中,既要对研究方法的“性能”有充分的认识,也要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有所把握,以避免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互斥”。比如,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于心理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也许是不应怀疑的,但如果这一指导作用使心理学变成了物质与意识关系的演绎,那么这就大成问题。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

4

在学术研究中,也经常碰到主观性与客观性关系的困惑。所谓主观性,主要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观点指导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所谓客观性,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具有的事实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中国极少学者赞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价值悬置”,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学术研究客观性极差,于是大多数学者在处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观、客观关系时都持一种折衷的态度,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 20 世纪绝大多数时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是:轻视事实、歪曲史料、价值肆虐、意识形态泛滥,所以我把主观、客观关系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实在是由这个问题的分量所决定的。

全书以发生在 20 世纪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学术争鸣为话源,努力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研究方法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法的种类、演变、走向以及上述提到的研究方法三大问题,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和较深入的讨论。其良苦用心在于,为当今乃至往后的中国学术研究与发展提供一面镜子。如愿与否,只有留给历史去评说。

目录

序	1
弁言	1
第一章 现代研究方法登陆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	1
一、历史使命与学术使命	1
1. 缘于起贫救弱的学术反省	1
2. 中国古代学术方法之病	3
二、汉学方法与宋学方法	5
1. 宋学之衰与汉学之兴	6
2. 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汉学宋学的融合	8
三、西学的方法警示	11
1. 研究方法有助于社会和科技进步	12
2. 研究方法需要学术精神	12
3. 研究方法有助于学术创新	14
4. 研究方法的生命在于应用	16
四、传统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	18
1. 学问实用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	18
2. 学问专业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	19
3. 学问科学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	20
第二章 现代三大研究方法的输入	26

一、自然科学方法的输入及其基本特征	26
1. 自然科学方法的输入	27
2. 自然科学方法输入的特点	34
3. 自然科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38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输入及其基本特征	41
1. 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输入	41
2. 马克思主义方法输入的特点	52
3. 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主要特征	55
三、人文主义方法的输入及其基本特征	58
1. 人文主义方法的输入	58
2. 人文主义方法输入的特点	66
3. 人文主义方法的基本特征	67
第三章 现代三大研究方法的互动	72
一、人文主义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互动	72
1. 人生观是主观抑或客观之争	73
2. 科学在解决人生观问题作用上的分歧	75
3. 思想层面的两大方法关系的解读	81
二、自然科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互动	83
1. 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之争	84
2. 哲学消灭与否之争	89
3. 思想层面的两大方法关系的解读	95
三、马克思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的互动	98
1. “革命文学”之争	98
2. “阶级文学”之争	100
3. 思想层面的两大方法关系的解读	103
四、三大研究方法互动的检讨	105
1. 现实社会问题：三大方法互动的轴心	106
2. 汉学与宋学：三大方法互动的学脉	107